

减税近两千亿 个税改革开了个好头

焦点 评论

3月12日上午,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“部长通道”接受采访时,就个税改革透露了两组数据。第一组数据是,去年10月1日到今年1月份,四个月共减税近两千元,说明这次改革减税力度大。第二组数据是,工薪阶层减税面是百分之百,8000万人无需再缴个税,反映个税改革减税面广。

据王军介绍,工薪阶层的减税面是百分之百,其中8000万人不用再缴纳个人所得税,还有6500万人的减税幅度在70%以上。这意味着此次个税改革后,我国工薪阶层的税负将会大大减轻,这对于改善民生、拉动消费将会产生积极作用。

四个多月减税近两千元,是这一轮个税改革的第一份“成绩单”,为个税改革开了个好头。这说明有关方面严格落实了修改后的《个人所得税法》,也说明公众尤其是工薪阶层已经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。而且这一改革初见成效,给了有关方面和纳税人更多信心。

可以预计,第二份、第三份改革“成绩单”或者全年“成绩单”将会更亮丽,纳税人负担将会进一步减轻。这是因为,专项附加扣除的效果还没有真正显示出来,随着专项附加扣除措施持续推动,主动申报扣除的纳税人将会越来越多,全年交出的“成绩单”将会更加令人期待。

根据《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》规定,有的项目是按每月定额标准扣除,如子女教育等;有的是按照每年定额标准扣除,如大病医疗。按月扣除的项目,由于申报、扣除存在滞后性,效果不会立即显现。按年扣除的项目,次年才能申报、扣除,效果之后才能显现。这就是说,减税近两千元是个税改革的初步效果,主要是起征点上调的结果。要想看到起征点上调、税率变化、专项附加扣除等措施的完整减税效果,要等到2020年。

由于个税关乎方方面面,今年“两会”期间,一些代表委员对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有更多期待。如全国政协委员刘晓庄建议,增加0至3周岁子女抚养专项附加扣除项目,以缓解“生得起,养不起”。人大代表房莉建议,将丧失劳动能力配偶扶养费纳入专项附加扣除。

上述建议,对于进一步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、促进个税公平具有积极意义,值得有关方面倾听。当务之急是落实好目前现有的六项专项附加扣除,既是积累操作经验,也让纳税人先获益。□冯海宁

社会 透视

吸引学生学医 待遇和尊严 一个不能少

医生的付出与获得是严重不匹配的。首先看看收入情况,根据《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》显示,2017年,整体来看,71.6%的医生工资水平低于8000元/月,工资在10000元/月以上的医生占比仅为13.1%,而25岁以下的从业者平均年收入仅为44505.33元。

同时执业后强度偏高、压力大也是常态。有数据显示,77%的医生表示曾一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,24.6%的医生工作时曾超过80小时。这种压力大、收入又不见得特别高的工作,的确会让一些人望而却步,从而放弃从医的追求。不仅如此,还要面临严峻的医患关系,有时候甚至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。执业环境不佳是当下一些优秀人才不愿选择医生职业的重要原因。

所以,想要吸引优秀的学生学医或留住优秀的医学人才,关键还是要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和从业环境,特别是从业环境。此前,国务院印发了《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8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》,允许医院突破工资调控水平,允许医院收入用于人员奖励,这是一个好的开端。下一步要做的就是,多部门需要联手发力,改善医生执业环境,及时、依法处置医患矛盾,让医生不仅有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,更有职业的尊严。□张炳剑

漫 评

网上购物忙

近日,商务部发布信息显示,2018年全国网上零售额突破9万亿元,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7万亿元,同比增长25.4%,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5.2%,较上年提升7.3个百分点。与此同时,线上线下融合、业态模式创新、质量服务提升等新动能正加速形成。□文/明生 图/曹一

一边是医患,一边是医科学生流失率和医生流失率居高不下,这一现象引起了两会代表的关注。近日,全国人大代表、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陈鑫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了《改善医生执业环境,培养更多优质临床医生》的建议。

他表示,纵观国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,还是发展中国家,只有一流学生才有机会进入医学院成为医生,可是在我国,出现了学生不愿学医的一股倾向,即使医学院毕业后,部分毕业生选择放弃医生职业。如何让更多人特别是优秀年轻人才愿意学医、从医,值得全社会关注。

的确,相比一些最热门的专业而言,医学专业确实有点“冷”。而早在2016年,来自北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的资料显示,我国每年培养60万医学生,但真正穿上白大褂的只有约10万人。尽管这个数据的精准性有待进一步考证,但《中国教育统计年鉴》的数据显示,学医人数的比例确实有所下降。

马云曾经说过,员工离职原因,无外乎一是钱没给到位,二是心里受委屈了。医院虽有别于一般的企业,具有公益性质,但在市场化背景下,也具备企业的属性。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选择弃医,大致也逃不脱这两点原因。

可以这么说,在现实中,大部分医生的付出与获得是严重不匹配的。首先看看收入情况,根据《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》显示,2017年,整体来看,71.6%的医生工资水平低于8000元/月,工资在10000元/月以上的医生占比仅为13.1%,而25岁以下的从业者平均年收入仅为44505.33元。

同时执业后强度偏高、压力大也是常态。有数据显示,77%的医生表示曾一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,24.6%的医生工作时曾超过80小时。这种压力大、收入又不见得特别高的工作,的确会让一些人望而却步,从而放弃从医的追求。不仅如此,还要面临严峻的医患关系,有时候甚至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。执业环境不佳是当下一些优秀人才不愿选择医生职业的重要原因。

经典 鉴赏

《万历十五年》

重 读

生的评语:“万历十五年为公元1587年,约明代中期偏后。这一年并无什么突出事件,稿中记这一年事情的也极少。稿中主要写了几个历史人物,即万历皇帝、张居正、申时行(此二人是宰相)、海瑞、戚继光、李贽。以这几个人为中心,叙述明朝中期的政治(如内阁组织、皇位继承、建皇陵、地方吏治)、经济(如漕运、赋税)、军事(如防倭……)、思想等情况,作者企图从这些方面说明封建社会的某些特点,正是这些特点导致明朝的灭亡,而这些封建社会的固有弊端也影响后代甚至现代。因此书名虽说是万历十五年,实际上是论述明代中期的社会情况,着眼点是较广的。”

傅璇琮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型编辑,长期在中华书局任职,他曾写下一篇文章:《黄仁宇、黄苗子和我》——记《万历十五年》在中华书局出版。其中:“我在中华虽然做过不少编辑工作,编过不少书,但回想起来,黄仁宇先生在中华出版的《万历十五年》,由我经手,却是最值得回味的。”并说,黄仁宇先生“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著作,享誉中国的海峡两岸,及日、美与欧洲英、德、法等国。北京的三联书店已出版了好几种他的大部头专著。但他的为人所知,实事求是地说是从《万历十五年》开始的。这本书的撰写,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、观察社会的眼光。虽说该书早已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英文本,但寻芳遗迹,在东亚和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,还恰是从中华书局1982年5月所出的中文本开始的。”中华书局这一本子,初版一次就印了27500册,很快就销售一空,特别在台湾省学界,反应很强烈,认为是难得的好书。接着日本、韩国就相继出了自己的译本。此后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增补本。

石之轩新作《山水与朔漠的怨怼》出版

石之轩新作《山水与朔漠的怨怼》出版

近日,陕西作家石之轩新作《山水与朔漠的怨怼》——蒙古铁骑的灭宋之路》由万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。该书24万字,以辽宋金元时期民族战争与同化融合为主线,勾史钩沉,还原历史关键节点的细节、真相,探索两宋灭亡的深层原因。

石之轩新作《山水与朔漠的怨怼》出版

石之轩新作《山水与朔漠的怨怼》出版

作者对宋朝的灭亡持同情态度,认为与辽、金、元相比较,宋朝的武力虽不算强大,但在社会发育、政治机制、技术进步及工商业发展模式等方面,宋朝与现代国家最为接近,只隔着薄薄的一层纸,只要捅破这层薄纸,就可以与现代无缝对接。因此,这本书不是纯粹的史学论著,也不是通俗的历史知识普及书籍,而是文学化了的史学探索书籍。

石之轩新作《山水与朔漠的怨怼》出版

石之轩新作《山水与朔漠的怨怼》出版

石之轩原名路经济,西安临潼区人。著作涉及哲学、文学、历史、教育及国民性研究等多个方面,《山水与朔漠的怨怼》是他公开出版的第九部著作。□田冲

民生 视角

在全国两会,新能源汽车特别是“甲醇汽车”又一次被不少代表委员所提及,公众也议论颇多。去年2月17日,西安市政府印发《西安市鼓励甲醇汽车产业发展若干政策》支持甲醇汽车产业发展。同年12月,首批吉利甲醇出租车投入西安市场。此次全国两会,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科学院院士郝跃也说:“陕西是富煤省份,西安市因地制宜发展甲醇燃料,替代汽油、柴油及天然气,可以推动本地能源的深加工,也可以促进能源多元化利用。”

热 门 话 题

面对能源危机和环境保护的双重挑战,近年来,国内各大企业都在寻找新能源材料代替传统能源。尤其是汽车行业,除混动和纯电动汽车外,“甲醇汽车”也出现在公众视线中。

基 层 减 负 一 个 并 不 轻 松 的 话 题

无须详细列举“甲醇汽车”的诸多优点,至少其有使用成本低、安装代价小、减少排放、使用方便以及资源丰富等优点。更重要的是,甲醇燃料作为新能源的一种,具有低排放、低污染、绿色环保等优势,符合国家环保和节能减排的政策要求。

热 门 话 题

日前,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《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》,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“基层减负年”。消息读罢,犹如一股春雨滋润心田,但这又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。

热 门 话 题

常言道,形式主义,根在官僚主义;官僚主义,必然形式主义。时下,虽然反“四风”以来,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有所收敛,但仍然顽固地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存在着。现实中,基层工作普遍存在会议多、文件多、报表多、材料多、迎检多、汇报多等问题,让基层干部穷于应付、疲于奔命。而且近年来更有新变种,比如近来引起热议的“伴件不文、事事留痕”现象,致使很多工作只顾“面子”不顾“里子”,或者说,顾了“面子”,就顾不了“里子”,这一形式主义的新变种,愈演愈烈,苦不堪言。有人曾感叹,“许多工作就是‘文档管理’凡事留痕”而已。

热 门 话 题

面对文山会海,笔者曾看到《人民日报》一篇报道:“一名乡镇工作人员一年开了280多场会,而且不少会还是重复开。”不由人联想到一副对联:“上联:今天开会明天开会天天开会;下联:你也讲话他也讲话人人讲话;横批:无人落实。”

热 门 话 题

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,各级政府要坚决反对和整治一切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,让干部从文山会海、迎评检查、材料报表中解脱出来,把精力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。响鼓还需重锤敲。“基层减负年”,《通知》中有硬杠杠。一是层层大幅度精简文件和会议;二是明确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10页,地方和部门也要按此从严掌握;三是提出地方各级、基层单位贯彻落实中央和上级文件,可结合实际制定务实管用举措;四是强调少开会、开短会,开管用的会。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心系基层、关爱干部的深厚情怀,表明了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、持之以恒狠抓作风建设的坚定决心,树立了为基层松绑减负、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实干导向。□张翟西滨

热 门 话 题

对于《万历十五年》的评论实在是太多了,我只有赞赏和感慨,再写是多余的。只有一句话可以概括:他改变了我们史学教科书的叙述方式,令人耳目一新,开阔了人们的视野,告诉人们,历史并不是那么非彼即此、非善即恶、非忠即奸的模式,为人处世、从政为官的所作所为,出自理想的信念固然是其基础,但社会的复杂和情感的掺杂往往令人难保初衷。个人再英明神武,在政治和社会上的作为,也仅仅是昙花一现。在特定的时代里,历史自有其发展的轨迹,受制于“共识”尤其是所谓“权臣”的评价并未超越传统的偏见——以皇帝的意愿是否得以实现作为基准,而忽视了他们的价值取向、政治作为和社会治理的效果。有明一代,因为“四书”的价值观念所锻造的文人“初心”和文化群体“始终不渝”的坚守,已经被社会所共同推崇,并成为天下的共识。然而作为“四书”所造就的这些文官势力会如此“视死如归”,敢于与一些违背“道统”的势力做彻底的抗争以至于斗争甚至牺牲自己而不惜,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?中国历史到了宋明以后何以不再出现“暴君”和“独裁者”,文官集团难道仅仅是“愚忠卖身”那么低级简单的境界吗?皇权的限制、权臣的出现、诤臣的亮剑等等,到底该如何评价,是不是也该引起我们新的思考?□李郁

热 门 话 题

其实,我以为,这只是现象。黄仁宇给我们出了一道题。我以为,他对于“文官集团势力”的贬抑是值得商榷的。黄仁宇陷入了皇权统治时代“唯我独尊”思维定式的漩涡里难以自拔,却忽视了宋明以后皇权与文官共治的时代特征,而将国家的治理成效寄望于明君的有作为,而且,对于“阁老”尤其是所谓“权臣”的评价并未超越传统的偏见——以皇帝的意愿是否得以实现作为基准,而忽视了他们的价值取向、政治作为和社会治理的效果。有明一代,因为“四书”的价值观念所锻造的文人“初心”和文化群体“始终不渝”的坚守,已经被社会所共同推崇,并成为天下的共识。然而作为“四书”所造就的这些文官势力会如此“视死如归”,敢于与一些违背“道统”的势力做彻底的抗争以至于斗争甚至牺牲自己而不惜,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?中国历史到了宋明以后何以不再出现“暴君”和“独裁者”,文官集团难道仅仅是“愚忠卖身”那么低级简单的境界吗?皇权的限制、权臣的出现、诤臣的亮剑等等,到底该如何评价,是不是也该引起我们新的思考?□李郁

热 门 话 题

对于《万历十五年》的评论实在是太多了,我只有赞赏和感慨,再写是多余的。只有一句话可以概括:他改变了我们史学教科书的叙述方式,令人耳目一新,开阔了人们的视野,告诉人们,历史并不是那么非彼即此、非善即恶、非忠即奸的模式,为人处世、从政为官的所作所为,出自理想的信念固然是其基础,但社会的复杂和情感的掺杂往往令人难保初衷。个人再英明神武,在政治和社会上的作为,也仅仅是昙花一现。在特定的时代里,历史自有其发展的轨迹,受制于“共识”尤其是所谓“权臣”的评价并未超越传统的偏见——以皇帝的意愿是否得以实现作为基准,而忽视了他们的价值取向、政治作为和社会治理的效果。有明一代,因为“四书”的价值观念所锻造的文人“初心”和文化群体“始终不渝”的坚守,已经被社会所共同推崇,并成为天下的共识。然而作为“四书”所造就的这些文官势力会如此“视死如归”,敢于与一些违背“道统”的势力做彻底的抗争以至于斗争甚至牺牲自己而不惜,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?中国历史到了宋明以后何以不再出现“暴君”和“独裁者”,文官集团难道仅仅是“愚忠卖身”那么低级简单的境界吗?皇权的限制、权臣的出现、诤臣的亮剑等等,到底该如何评价,是不是也该引起我们新的思考?□李郁

热 门 话 题

其实,我以为,这只是现象。黄仁宇给我们出了一道题。我以为,他对于“文官集团势力”的贬抑是值得商榷的。黄仁宇陷入了皇权统治时代“唯我独尊”思维定式的漩涡里难以自拔,却忽视了宋明以后皇权与文官共治的时代特征,而将国家的治理成效寄望于明君的有作为,而且,对于“阁老”尤其是所谓“权臣”的评价并未超越传统的偏见——以皇帝的意愿是否得以实现作为基准,而忽视了他们的价值取向、政治作为和社会治理的效果。有明一代,因为“四书”的价值观念所锻造的文人“初心”和文化群体“始终不渝”的坚守,已经被社会所共同推崇,并成为天下的共识。然而作为“四书”所造就的这些文官势力会如此“视死如归”,敢于与一些违背“道统”的势力做彻底的抗争以至于斗争甚至牺牲自己而不惜,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?中国历史到了宋明以后何以不再出现“暴君”和“独裁者”,文官集团难道仅仅是“愚忠卖身”那么低级简单的境界吗?皇权的限制、权臣的出现、诤臣的亮剑等等,到底该如何评价,是不是也该引起我们新的思考?□李郁

热 门 话 题

其实,我以为,这只是现象。黄仁宇给我们出了一道题。我以为,他对于“文官集团势力”的贬抑是值得商榷的。黄仁宇陷入了皇权统治时代“唯我独尊”思维定式的漩涡里难以自拔,却忽视了宋明以后皇权与文官共治的时代特征,而将国家的治理成效寄望于明君的有作为,而且,对于“阁老”尤其是所谓“权臣”的评价并未超越传统的偏见——以皇帝的意愿是否得以实现作为基准,而忽视了他们的价值取向、政治作为和社会治理的效果。有明一代,因为“四书”的价值观念所锻造的文人“初心”和文化群体“始终不渝”的坚守,已经被社会所共同推崇,并成为天下的共识。然而作为“四书”所造就的这些文官势力会如此“视死如归”,敢于与一些违背“道统”的势力做彻底的抗争以至于斗争甚至牺牲自己而不惜,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?中国历史到了宋明以后何以不再出现“暴君”和“独裁者”,文官集团难道仅仅是“愚忠卖身”那么低级简单的境界吗?皇权的限制、权臣的出现、诤臣的亮剑等等,到底该如何评价,是不是也该引起我们新的思考?□李郁

热 门 话 题

其实,我以为,这只是现象。黄仁宇给我们出了一道题。我以为,他对于“文官集团势力”的贬抑是值得商榷的。黄仁宇陷入了皇权统治时代“唯我独尊”思维定式的漩涡里难以自拔,却忽视了宋明以后皇权与文官共治的时代特征,而将国家的治理成效寄望于明君的有作为,而且,对于“阁老”尤其是所谓“权臣”的评价并未超越传统的偏见——以皇帝的意愿是否得以实现作为基准,而忽视了他们的价值取向、政治作为和社会治理的效果。有明一代,因为“四书”的价值观念所锻造的文人“初心”和文化群体“始终不渝”的坚守,已经被社会所共同推崇,并成为天下的共识。然而作为“四书”所造就的这些文官势力会如此“视死如归”,敢于与一些违背“道统”的势力做彻底的抗争以至于斗争甚至牺牲自己而不惜,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?中国历史到了宋明以后何以不再出现“暴君”和“独裁者”,文官集团难道仅仅是“愚忠卖身”那么低级简单的境界吗?皇权的限制、权臣的出现、诤臣的亮剑等等,到底该如何评价,是不是也该引起我们新的思考?□李郁

热 门 话 题

其实,我以为,这只是现象。黄仁宇给我们出了一道题。我以为,他对于“文官集团势力”的贬抑是值得商榷的。黄仁宇陷入了皇权统治时代“唯我独尊”思维定式的漩涡里难以自拔,却忽视了宋明以后皇权与文官共治的时代特征,而将国家的治理成效寄望于明君的有作为,而且,对于“阁老”尤其是所谓“权臣”的评价并未超越传统的偏见——以皇帝的意愿是否得以实现作为基准,而忽视了他们的价值取向、政治作为和社会治理的效果。有明一代,因为“四书”的价值观念所锻造的文人“初心”和文化群体“始终不渝”的坚守,已经被社会所共同推崇,并成为天下的共识。然而作为“四书”所造就的这些文官势力会如此“视死如归”,敢于与一些违背“道统”的势力做彻底的抗争以至于斗争甚至牺牲自己而不惜,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?中国历史到了宋明以后何以不再出现“暴君”和“独裁者”,文官集团难道仅仅是“愚忠卖身”那么低级简单的境界吗?皇权的限制、权臣的出现、诤臣的亮剑等等,到底该如何评价,是不是也该引起我们新的思考?□李郁